

解放區文學中的疾病書寫

● 黃曉華

五四以來啟蒙文學的疾病書寫都潛含着對社會的抗議與對國民性的批判，而在解放區，隨着新社會的誕生，疾病不能再被當成抗議題材。任何對解放區某一方面的質疑都可能被視為對解放區本身的質疑而遭到批判。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這是一首著名革命歌曲中的一句歌詞。然而，由於貧窮落後的現實，疾病一直是困擾解放區農民和軍隊的一個大問題。1941年的八路軍幹部健康檢查，有檢查記錄者192人，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完全健康的51人，患一種病的50人，患二種病的68人，患三種病的2人，患三種以上病的二人。」^①在廣大農村，各種疫病更為嚴重。僅1941年夏，感染傳染性白喉、麻疹、赤痢、傷寒等疫病的，「甘泉三區患者876人，死亡186人，小孩佔三分之二。所到區域，男女有性病及婦女月經不調者佔百分之七十以上。」^②與疾病高發的現實並存的則是巫神與迷信，「由於邊區缺乏醫生，缺乏藥品，老百姓養成了有病不求醫的習慣。而是燒香、求神或者是叫魂，不衛生和迷信結合在一起。」^③在這種現實語境中，疾病治理不僅是一項以科學來戰勝迷信的啟蒙任務，而且是一項改善民眾生活、爭取民眾認同的政治任務。

正是因為疾病對解放區政治與生活的重大影響，《解放日報》於1941年11月24日開闢「衛生」專刊，李富春在〈「衛生」發刊詞〉中明確指出講求衛生的「嚴重的政治意義」與「嚴重的軍事意義」以及「積極的經濟意義」^④。面對這種啟蒙與政治的雙重需要，解放區文學陷入了一種兩難處境：面對迷信落後、疾病高發的社會現實，解放區文學應該承擔起以科學戰勝迷信的啟蒙使命；然而，在解放區「明朗的天」底下，疾病就像太陽的黑子，不應被過份關注。

五四以來的啟蒙文學傳統始終將疾病與社會抗議聯繫在一起，疾病的發生與舊社會的黑暗現實密切相關，因此疾病書寫包含了多重社會意蘊。如魯迅的《藥》和《孤獨者》、王思玷的《偏枯》、巴金的《寒夜》等，都潛含着對社會的抗議與對國民性的批判。而在解放區，隨着新社會的誕生，疾病不能再被當成抗議題材，甚至疾病本身也應該被消滅。在這一語境中，任何對解放區某一方面的質疑都可能被

視為對解放區本身的質疑而遭到批判。丁玲的《在醫院中》正是啟蒙與科學在政治與習慣面前全面敗北的真實記錄，這一作品後來的遭遇，更凸顯出革命語境中啟蒙立場與科學精神的困窘^⑤。

為了調和這種兩難處境，解放區文學構建了一種新的疾病話語生產與分配方式。疾病是一種生理現實，醫學則是一種話語生產。「在每個社會，話語的製造是同時受一定數量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的，這些程序的作用在於消除話語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⑥通過控制醫學話語的生產，解放區文學消解了疾病的危險性，構建了一種現代醫學神話。

一 疾病發生的政治區隔

要消解疾病的危險性，首先就必須消解疾病發生的社會抗議性質。「疾病的最大原因」就是「社會經濟基礎」^⑦，為了凸顯解放區革命的正確性與純潔性，也就需要對疾病的發生進行政治上的區分與隔離，以免其對解放區的社會經濟基礎造成「污染」。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中的「疾病」是一個關鍵能指，它在作品中起着重要的結構作用。小說中貞貞與霞村之間「離去—歸來—離去」結構背後的敘述動力就是「疾病」：她因離開霞村而患「病」，因患「病」而回到霞村，最後又因治「病」而離開霞村。在這裏，丁玲對貞貞的患病—治病在空間上進行了區分與隔離。對貞貞而言，敵佔區是疾病之源，而解放區則是治病之所。然而，丁玲通過敘述貞貞疾病的惡化，繼承了魯迅對國民性

批判的主題，解放區人們的閒言碎語正是導致貞貞疾病惡化的因素。在「我」眼中，貞貞很「健康」，她的眼睛「像兩扇在夏天的野外屋宇裏洞開的窗子，是那麼坦白，沒有塵垢」^⑧，從外表看來「一點有病的樣子也沒有，她的臉色紅潤，聲音清晰」^⑨。這個與「我」相處時的「健康」人，與家人相處時卻表現出明顯的病態，而且病得愈來愈重。「我」臨行前與貞貞最後一次見面時，她的病情嚴重惡化。由此，「我」明顯意識到「她現在所擔受的煩擾，決不只是肉體上的」^⑩，貞貞周圍的「健康」人對貞貞的「關心」，實際上充當了疾病惡化的催化劑。小說中病—非病之間的對立形成獨特的敘述張力，肉體上的病與精神上的病在文中形成一種對立與錯位：一方面是貞貞肉體上的疾病與精神上的健康，另一方面則是群眾肉體上的健康與精神上的病態，正是後者精神上的病態激化了前者肉體上的疾病。

最後，貞貞希望藉「治病」遠離家鄉「健康」人的「關注」，到一個精神健康的天地裏去「學習」與工作，以獲得「新生」：「我想，到了延安，還另有一番新的氣象。我還可以再重新作一個人，人也不一定就只是爹娘的，或自己的。」^⑪通過投身革命，不僅可以脫離爹娘，也可以脫離自己的過去，獲得「新生」，革命也就成為治療疾病的最佳「良藥」。通過這種治療，身體也可以成為屬於「革命」的身體。這一「離去—歸來—離去」結構，隱含着丁玲對疾病的雙重區隔：一方面是日佔區與解放區的區隔，貞貞的病是在日佔區感染的，那裏正是萬惡之源；另一方面則是鄉下與延安的區隔，在鄉下，解放區民眾的一些劣根性是激發貞貞病態的誘因，而延安則是治病之所，是獲得「新生」的希望所在。通過

在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時候》中，人物通過投身革命，可以脫離自己的過去，獲得「新生」，革命也就成為治療疾病的最佳「良藥」。通過這種治療，身體也可以成為屬於「革命」的身體。

解放區文學中，疾病不僅是對新舊社會進行對比與區隔的一種手段，而且是對解放區內部正確與錯誤思想進行區隔的手段。通過將疾病進行空間—時間—價值方面的區隔，解放區保證了自身的純潔性。

這種疾病感染與治療的空間區隔，保證了延安與革命的「潔淨」^⑭。

丁玲對疾病的發生進行了空間區隔，而孔厥則對疾病進行了時間區隔，從而避免解放區被疾病「污染」。當新時代的疾病無法醫治時，也有必要將疾病的根源追溯到舊社會。孔厥《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中的折聚英在1940年冬參加文化學習班時忽然發病。此時離她翻身已有兩年，但醫生確定她的病因時，還是追溯到「過去」，斷定「這女子，生理上，心理上，一定都受過大打擊，大摧殘」^⑮，而她發病的先天因素與現實原因則被忽略不計。折聚英在參加文化學習班時積極向上，然而儘管加班加點，她還是跟不上學習進度，這種力不從心的處境對這個追求「革命進步」的大齡農村婦女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也是其疾病突然爆發的一個重要誘因。然而，在醫生與作者那裏，這種現實原因被輕輕忽略過去。通過「過去」這一界定，疾病的發生被歸結為與舊社會有關，從而與解放區絕緣。

疾病不僅可以是對新舊社會進行對比與區隔的一種手段，而且可以是對解放區內部正確與錯誤思想進行區隔的手段，由此具有明顯的價值意味。歐陽山《高干大》中的任常有與高生亮（人稱「高干大」）不僅在思想上有着尖銳的對立，在身體方面也有着明顯的不同。任常有常年臉上身上都有病，疾病成為他迴避矛盾、逃避鬥爭的手段，最後，作者讓他在任桂花的婚筵上一死了之。高生亮儘管身體也不是很好，在合作社發展的過程中，也曾經因操勞過度而暈倒過去，但對黨的信仰使他內心始終充滿生命活力，一再度過難關。這種身體的健康—病態、生命力的旺盛—衰弱，

與他們思想和政治上的正確—錯誤正相對應，高生亮的疾病本身與他思想上存在的缺點也正相對應^⑯。

歐陽山寫出了疾病與思想的對應，趙樹理則發現疾病的發生與痊癒和政策的失誤與正確之間的對應。《邪不壓正》中聚財的疾病是政治的「晴雨表」^⑰：

聚財本來從劉家強要娶軟英那一年就氣下了病，三天兩天不斷肚疼，被鬥以後這年把工夫，因為又生了點氣，伙食也不好，犯的次數更多一點，到了這年（1947）11月，政府公布了土地法，村裏來了工作團，他摸不着底，只說又要鬥爭他，就又加了病——除肚疼以外，常半夜半夜睡不着覺，十來天就沒有起牀，趕到劃過階級，把他劃成中農，整黨時候幹部們又明明白白說是鬥錯了他，他的病又一天一天好起來。趕到臘月實行抽補時候又賠補了他十畝好地，他就又好得和平常差不多了。

小舅子安發打趣他時，他說得很明白：「只要不把咱算成『封建』，咱就沒有病了！」^⑱可見只要政治清明，疾病也自然可以痊癒，身體與政治在疾病的發生與痊癒中形成直接對應。

通過將疾病進行空間—時間—價值方面的區隔，解放區不僅保證了自身的純潔性，而且使疾病本身就成為解放區的正確性與純潔性的一種有效證明。

二 疾病治療的神話闡釋

儘管可以通過時間、空間與價值等手段將疾病與解放區區隔開來，從

而避免解放區被「污染」，但疾病這一沉重的歷史課題依舊是解放區必須要面對並予以解決的重大問題。疾病的治療不僅是科學問題，也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問題。「現在邊區的群眾，是要迫切解決『財旺人不旺』的問題的。從延安市第二次衛生委員會上各區長的報告中，知道今年一月到四月中旬，共死去市民一百零八人。……這些病與死，當然耽誤了生產。」^⑧疾病的治理不僅關係到個體的生存與發展，而且關係到解放區的生存與發展。

與疾病高發密切相關的，是農村中普遍存在的迷信。因此，疾病的治療不僅有着啟蒙意味，而且有着政治意味。一方面，現代醫學與巫神對疾病治理權的爭奪，意味着科學與迷信的交鋒；另一方面，推廣醫學也是爭取民心、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在這一背景下，丁玲描寫與巫神鬥法的《田保霖》獲得了毛澤東的讚賞：田保霖「想出了一個治巫神的辦法，他找了一個醫生來，開一個藥鋪，四處替人灌羊治病，三個月中治了三百個人，灌羊三千，有病的人都找到合作社來。關巫神說：『田保霖本領大，神神也不敢來了。』」^⑨

葛洛的《衛生組長》同樣以凸顯醫學相對於迷信的有效性來消解巫神存在的合理性，從而將民眾引導到信奉醫學的道路上來。小說中，「我」的婆姨害了病一直不好，「我媽」與丈母娘都認為她是害了「邪病」，要求請巫神為她驅邪，被作為衛生組長的「我」明確拒絕，因為「改造巫神，也是我們衛生公約上訂的一條」^⑩。「我」及時請來的醫生將感染上疫病的婆姨搶救了過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另一家不相信醫生而相信巫神的人家，

由於耽擱病情導致病人年紀輕輕就沒了。通過這種對比，使「我媽」與丈母娘的思想轉到相信醫學上來了，消滅了巫神的市場與生存空間。

儘管這種對醫學有效性的書寫有着明顯的簡化傾向，但丁玲與葛洛還是凸顯出改造巫神的過程中醫學與科學啟蒙的重要性。1944年11月陝甘寧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開展群眾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對此有清楚深刻的認識：「邊區的大量巫神，主要是邊區文化落後以及醫藥缺乏和衛生教育不足的產物。因此，要消滅巫神的勢力，首先要普及衛生運動和加強醫藥工作，否則就是主觀的空想。採取脫離實際、強迫命令的單純行政手段，是無濟於事的。」^⑪

然而，在《高干大》中，這種啟蒙意識全面退場，科學與迷信的鬥爭演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鬥爭。小說第一章「人民的要求」就寫出了解放區缺醫少藥、兒童死亡率較高的現實。基於這一現實，「人民的要求」包含着三個層面：首先是科學要求，農村中兒童的高死亡率，使得人民迫切需要現代醫學；其次是經濟要求，正是這種需求，刺激了醫藥合作社的產生與發展；第三是政治要求，順應民意是黨的力量之源。這一「人民的要求」，本來應該包含並基於用科學擊退迷信的啟蒙要求，因為「要真正打敗巫神，不是單靠政治工作所能完成任務的事，更不是一個合作社主任所能完成任務的事」，然而，如竹可羽評論說：「在本書裏，合作社醫生李向華只像影子一樣一晃不見了。反巫神的擔子放在高干大肩上，但是高干大只能把巫神翻到深溝裏去跌死罷了，而且差點兒自己也死在一起」^⑫。

疾病的治療帶有啟蒙意味和政治意味。一方面，現代醫學與巫神對疾病治理權的爭奪，意味着科學與迷信的交鋒；另一方面，推廣醫學也是爭取民心、改善民生的重要手段。

在解放區文學作品中，政治上的翻身使人物生理上的疾病得以痊癒，而疾病的痊癒又凸顯出政治的「救世良藥」性質。人的生理身體的複雜性被簡約成翻身過程中的一個符號，翻身（毛主席）成為包治百病的萬靈藥。

本身還有着迷信思想殘餘的高生亮與巫神郝四兒的鬥爭，並沒有多少「科學」色彩。儘管作者通過郝四兒虐待羅志旺老婆致死的場景渲染了巫神的殘暴與愚昧，但作者並沒有把對巫神的批判提升到科學的高度。病人死後，巫神倒打一耙，說病人是被醫生李向華治死的。高生亮對這種說法根本無法有力回擊，他所能做的僅僅是試圖以武力使郝四兒屈服，他最後的「勝利」只是對巫神肉體上的消滅而不是精神上的勝利。誠然如馮雪峰所言：「共產黨人的思想、堅信和品質，是完全得到勝利了。」^②然而，這種勝利並不是依據科學自身的內在邏輯力量，而是依據思想信念與政治權威^③。高生亮憑藉對黨的信念克服了對鬼神的恐懼，憑藉政府的支持最終從肉體上消滅了郝四兒，科學與迷信的鬥爭最終成為政治鬥爭的一部分。「一切服從於政治」^④，醫藥工作由科學工作到經濟工作，最終變成政治工作，科學本身因此被忽略。

只寫出了一個「影子一樣」的醫生的《高干大》強調了政治在改造巫神、反對迷信方面的重要性與有效性，趙文節的《肉體治療和精神治療——一個醫生講的故事》則凸顯出醫生治病時政治工作在身體治療方面的必要性與優先性，由此「醫學」成為「政治的醫學」。二十五歲的二流子王四在舊社會染上一身壞習氣，吃喝嫖賭，敲詐偷騙，樣樣都來。他爹王老漢嫌他二流子名頭臭，也叫他給偷怕了，不讓他回家。王四翻身後，他爹勉強收留了他，但他還是拒絕勞動改造。他爹拿刀給他切洋芋種籽，他卻試圖拿刀剖腹自殺。被送到醫院搶救後，他一心求死，不願配合醫生的治療。作為醫生的「我」意識到：「事實告訴

我：病人不僅是有着肉體的痛苦，更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痛苦；醫藥的治療在這樣情形下是不能完全的作用的。」^⑤於是「我」對他進行精神開導，透過思想改造工作，使他配合治療，從而獲得肉體與精神上的雙重「再生」。由此「我」得出結論：「一個革命的醫生，他不但要能夠解除和治療病人肉體上的痛苦，而且還要能夠解除和治療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所以在我們那裏提出的口號，就是：『一個醫務工作人員，同時必須是一個政治工作人員。』」^⑥

政治工作在疾病治療中的優先性與有效性，使政治超越「世界醫學」，獲得「『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⑦。思想改造不僅對落後人物具有「治療」作用，而且對先進人物有更強烈的「治療」作用。丁玲筆下的陳滿，思想混亂時連續幾天臥牀不起，而只要自己思想一通，馬上就好了：「咱頭上一清醒，想通了道理，就沒病啦。」^⑧政治取代醫學成為疾病治療中的首要因素，疾病的痊癒則是政治的有效性與優先性的最好證明。馬烽的《金寶娘》雖然提到了金寶娘所患的性病是因為「打了兩針六〇六」才「好光了」，但作者明確地將疾病的痊癒與政治聯繫起來：只有翻身後金寶娘才有可能不賣淫，才有可能獲得「六〇六」，因此，金寶娘「含着兩眶熱淚，激動的說：『感謝毛主席救了我們一家！』」^⑨政治上的翻身使生理上的疾病得以痊癒，而疾病的痊癒又凸顯出政治的「救世良藥」性質。人的生理身體的複雜性被簡約成翻身過程中的一個符號，翻身（毛主席）成為包治百病的萬靈藥。

福柯 (Michel Foucault) 在分析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醫學時曾指出^⑩：

大革命前後的數年間，先後出現了兩種有影響的神話。它們的說法和指向都完全相反。一種是醫學職業國有化的神話，主張把醫生像教士那樣組織起來，對人的身體健康行使類似於教士對人的靈魂的那種權力。另一種神話認為，清淨無為的社會回歸到原初的健康狀態，一切疾病都會無影無蹤。但是，我們不應該被這兩種說法的表面矛盾所迷惑：這兩個夢想是同構的。

它們都表現出政治相對於醫學的優先性。前一種神話凸顯出政治革命的有效性，革命完全可以有效地解決生理問題；後一種神話則凸顯出政治革命的純潔性，在這個純潔的社會中，疾病最終會銷聲匿迹。無論是凸顯革命的有效性，還是革命的純潔性，這種醫學神話都將身體簡化為一個政治符號，生理身體的複雜性被忽略不計，醫學因此成為政治的附庸。

三 結語

強調「文藝服從於政治」^①的解放區文學，為了凸顯政治的有效性與純潔性，同樣構建了一種現代醫學神話。它通過疾病發生的政治區隔，保證了解放區革命的純潔性；而通過疾病治療的神話闡釋，凸顯了解放區政治的有效性。這種醫學神話消解了解放區迫切需要科學啟蒙的現實陰影，構建出一片「明朗的天」。在這種神話的建構過程中，解放區文學與五四啟蒙文學傳統分道揚鑣，不僅在寫作內容方面，解放區文學忽視了醫學本身應該具有的科學意識，消解了生理身體的複雜性，將其轉化為一種純粹的

政治身體，使其成為一種宣講政治的正確與有效的工具；而且在思維方式上，背離了科學思維的理性意識與實證精神，將政治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它中斷了五四以來的「祛魅」進程^②，開啟了一種「政治萬靈」的神話書寫。

正如周作人所言：「像這最能實證的生理及病理的學術方面還容留得下迷信，別的方面可想而知。」^③在這種神話書寫中，疾病終究是太陽上的黑子，最終退出文學書寫的視野。直到文化大革命「高大全」的身體神話全面登場，人被壓縮成沒有生理身體屬性的單一平面。

在寫作內容方面，解放區文學忽視了醫學本身應該具有的科學意識，消解了生理身體的複雜性，將其轉化為一種純粹的政治身體；在思維方式上，背離了科學思維的理性意識與實證精神，將政治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藥。

註釋

① 馬荔：〈從幹部健康檢查說起〉，《八路軍軍政雜誌》，1942年第4卷第1期，頁17。統計數據只有173人，原文如此。

② 〈邊區半年來衛生工作展開 防疫隊深入農村工作〉，《解放日報》，1941年10月4日。

③ 泉生：〈邊區的青年衛生員〉，《解放日報》，1941年10月20日。

④ 李富春：〈「衛生」發刊詞〉，《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4日。對衛生工作的重視是《解放日報》一以貫之的主題之一，在「衛生」專刊創刊前，《解放日報》就有相當篇幅報導解放區的衛生工作。從1941年11月24日「衛生」專刊創刊到1945年1月20日「衛生」專刊改版，共出版六十二期，基本每月一期，每期一整版。此後改為專欄，每十天左右出版三分之一版。

⑤ 黃子平在「病的隱喻和文學生產」一章中通過對《在醫院中》等作品的分析，對解放區的「社會衛生學」有着比較深入的引申與論述。但其論述的基點在於對「疾病」的引申，由身體的疾病引申到精神的疾病。

本文則關注生理疾病，由此切入解放區文學的身體建構與神話思維。參見黃子平：《「灰闌」中的敘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頁154-74。

⑥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蕭濤譯：〈話語的秩序〉，載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3。

⑦ 魯之俊：〈疾病的最大原因——社會經濟基礎〉，《解放日報》，1942年5月18日。

⑧⑨⑩⑪ 丁玲：《我在霞村的時候》，收入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四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223；224；226；232。

⑫ 如同部分研究者指出的，這篇小說包含着一种反諷意味：「我」本來是為了養病而離開延安來到霞村，這就說明延安本身也可能產生疾病。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對貞貞「一廂情願」的「新生」構想，包含着懷疑。

⑬ 孔厥：《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收入康濯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一冊（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頁346。

⑭ 歐陽生：《高干大》（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⑮⑯ 趙樹理：《邪不壓正》，收入《趙樹理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0），頁260-61；262。

⑰ 傅連璋：〈陝甘寧邊區群眾衛生工作的一些資料〉，《解放日報》，1944年4月30日。

⑱ 丁玲：〈田保霖〉，《解放日報》，1944年6月30日。

⑲ 葛洛：〈衛生組長〉，《解放日報》，1945年5月12日。

⑳ 〈陝甘寧邊區文教大會關於開展群眾衛生醫藥工作的決議〉，載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著：《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頁481。

㉑ 竹可羽：〈評歐陽山的《高干大》〉，載《論文學與現實的關係》（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頁42。

㉒ 馮雪峰：〈歐陽山的《高干大》〉，載《論文集》，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211-12。

㉓ 在《高干大》中，沒有任何人把握到郝四兒治病與患病的內在矛盾：他在拒絕開荒時，舉出的理由一是要為病人治病，二是自己有病；然而，他自己作為一個治病的人，卻治不好自己的病，由此可以凸顯出所謂治病的荒謬。

㉔ 歐陽山：《高干大》，頁66。

㉕㉖ 趙文節：〈肉體治療和精神治療——一個醫生講的故事〉，《解放日報》，1945年2月17日。

㉗ 吳伯蕭：〈出發點〉，載雷加主編：《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散文·雜文編》，第一冊（重慶：重慶出版社，1992），頁576。

㉘ 丁玲：〈永遠活在我心中的人們——關於陳滿的記載〉，載《丁玲全集》，第五卷，頁274。

㉙ 馬烽：《金寶娘》，收入《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小說編》，第一冊，頁124。

㉚ 福柯(Michel Foucault)著，劉北成譯：《臨牀醫學的誕生》（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頁35。

㉛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867。

㉜ 有論者將《白毛女》視為解放區文學以科學進行「祛魅」的代表作，而這似乎只是皮相之見。因為這種書寫中很難看到「科學精神」。科學對現代文學的影響應該從寫作內容與思維方式兩個層面呈現，而就思維方式言，解放區文學極少「科學」色彩，反而呈現出濃厚的「神話」意味。《白毛女》「將鬼變成人」這一說法本身就是一種「神話」表述。本文就是一次從醫學角度切入解放區文學「神話」思維模式的嘗試。

㉝ 周作人：〈《醫學周刊集》序〉，載鍾叔河編：《周作人文類編·人與蟲：自然·科教·文明》（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8），頁540。

黃曉華 文學博士，湖北大學中文系講師。